

司徒允昌 著

秘书学 综论

上海文化出版社

司徒允昌 著

秘书学 综论

ue
nen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书学综论/司徒允昌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11

ISBN 7-80646-351-8

I.秘… II.司… III.秘书学-教材 IV.C93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949 号

责任编辑:林爱莲

封面设计:陈 平

秘书学综论

司徒允昌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58,000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6-351-8/G·299

定价:14.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2-6063782

MULU

目录

第一章 秘书与秘书机构 1

一、秘书工作的起源	1
二、秘书的涵义	9
三、秘书的分类	14
四、秘书机构的设置	18
五、秘书机构的地位	22

第二章 秘书机构的职能 25

一、辅助决策	26
二、处理信息	31
三、参与协调	37
四、协助控制	41
五、管理事务	47

第三章 秘书工作的特点和要求	52
一、秘书工作的特点	52
二、秘书工作的要求	58
第四章 秘书工作的原理和原则	67
一、秘书工作的原理	67
二、秘书工作的原则	77
第五章 秘书人员的修养和才能	91
一、秘书人员的修养	91
二、秘书人员的才能	111
第六章 秘书人员的思维和意识	119
一、秘书人员的思维	119
二、秘书人员的意识	138
第七章 秘书的权力和影响力	148
一、秘书人员的权力	149

二、秘书人员的影响力	159
------------	-----

第八章 秘书与环境 171

一、秘书人员对环境的认识和理解	171
二、秘书人员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	183

第九章 领导与秘书 193

一、领导应善待秘书人员	193
二、领导应善用秘书人员	200

第十章 秘书学及公文写作的特点和教法 209

一、秘书学的基本特征	209
二、秘书学教学方法研究	214
三、公文写作的基本特点和要求	220
四、公文写作教学方法研究	229

第一章 秘书与秘书机构

研究秘书学自然离不开“秘书”，没有秘书，秘书学便无从谈起；同时，秘书的活动又离不开一定的组织机构，否则秘书也就失去了活动的组织依托。所以，秘书学的研究必须首先把目光投向秘书和秘书机构这两个研究的基本要素。

一、秘书工作的起源

秘书学的研究当然应该以当前的秘书与秘书工作为其主要的对象，但是追溯秘书工作的起源也同样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今天的秘书工作毕竟是从那个时代逐渐发展过来的，是那个时代已经初步决定了秘书工作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点。杨尚昆同志在为李欣先生编著的《秘书工作》所写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李欣同志的这本书今后还可继续修正和补充，其中关于秘书工作的沿革和回顾两章，可能是限于篇幅没有展开写，而这些内容是很重要的。”^①有关秘书工作的起源是秘书学界十几年来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其中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前期为争论的高峰期。

1985 年李欣先生在其编著的《秘书工作》中认为：“秘书工作是随文书的产生而

出现的。探讨中国文书的起源,必须紧紧抓住两点:一是中国文字的出现;二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出现。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文书,是指国家和阶级集团的公务文书,它的出现,不但是有了文字以后,而且,也总得在有了阶级统治以后才有可能。”^②至于中国究竟什么时候出现秘书和秘书工作,李欣先生的论证是相当谨慎的。他不以传说为据:“如果把黄帝或苍颉之造字算做中国有文字的开头,距现在约 4600 多年。但是黄帝造字等等,都是传说,谁也没有看见那个文字是什么样子,不能作为论据。”^③于是,李欣先生把中国秘书的源头确定在周代:“总之,文书在周代已经作为行使政事的工具通行开来,已经无可置疑。人们称周以后的公事文件为官文书,说明是从周代开始算起的。”^④李欣先生接着分析:“既为官文书,正好可以说明这种文书是伴随着阶级统治而来的。有了阶级,就有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为了进行统治,就要说话,就要立刑制法,就要利用文字为其服务。于是就有了文件——官文书。”^⑤李欣先生对文书的这种看法源于斯大林的观点。斯大林认为:“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⑥而李欣先生在书中也正是引用了斯大林的这句话。

1989 年,在由徐瑞新、李欣、李登柱等编著的《中国现代秘书工作基础》中,引用了新的考古资料,该资料证明,在西安市西郊一个原始社会遗址发掘出的甲骨文比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要早 1200 年以上。虽然有了这个材料,但李欣先生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观点,还是把中国秘书工作的起源定在了周代。

然而,同在 1989 年,翁世荣先生主编的《现代秘书学》却

有不同的见解,尽管与李欣先生所引的考古资料相同。关于秘书工作产生的条件,翁世荣先生认为:“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兼备两个条件:“文字和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⑦“社会组织”同李欣先生所讲的“阶级统治”显然是不同的。翁世荣先生明确指出:“人类的秘书工作在国家形成以前就产生了。”^⑧而且还作出推定:“从大的范围来说,我国的秘书工作起源于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即黄帝至舜时期,约距今 4500 年至 4100 年之间;从小范围来说,它起源于黄帝时期,即距今约 4500 年至 4400 年,最迟启端于尧舜时期。”^⑨

1993 年,李欣先生主编的《中国秘书发展史》出版。在这本著作中,作者采纳了翁世荣先生的观点,对以前“统治阶级”的说法作了修正:“人类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文字、社会权力机构。”^⑩“社会权力机构”同“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意思相近;而且,也将中国秘书工作产生的时间推前到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

总的来说,关于中国秘书工作的起源,学术界有两种观点,陈合宜先生对此作了归纳:“秘书工作起源于何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起源于远古的黄帝时代,一种认为起源于夏代的奴隶社会。”^⑪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支持前一种说法的学者占多数。

关于秘书工作的起源是否只有出现了“文书工作”才有可能,而“社会权力机构”或“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同秘书工作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两个问题似乎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可以这样说,即使把起源的时间定在黄帝时代,也不见得就是秘书工作的源头。

这里先谈文书工作与秘书工作起源的关系。

黄帝时期有文字,这已为考古资料所证明;黄帝时期有文书,并有了专门从事文书工作的“史官”,虽然只是传说,但毕竟可信。所以,说黄帝时期有秘书工作,应该没有什么疑义。不过,是不是有了史官,有了文书工作,才开始有秘书工作,倒也不一定。

在黄帝之前,就有原始文字,但不统一,所谓“苍颉造字”,则是苍颉对各部落的文字进行搜集、整理、加工,使之得到统一。不过,苍颉所造的字当时未必在整个部落联盟得到通行,因为掌握这种新文字一是要教,二是要学。从不统一到统一,需要一个过程,从统一到通行,也需要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时间更长、工作更艰巨的过程,即使仅仅让各部落首领能认识这些字都不容易做到。黄帝身边有一批史官,据说苍颉、沮诵等人都是史官。翁世荣先生说:“史官的职掌是陪侍于黄帝左右,记录言行,以备忘、信守,并起咨询作用。”^⑩翁世荣先生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因为《史记》和《汉书·古今人表》都说苍颉是黄帝的史官,后有人说他是左史,而沮诵则是右史,如按《礼记·玉藻》“左史记动,右史记事”的解释,那么苍颉负责记事,而沮诵则负责记言。苍颉和沮诵等史官是当时的秘书人员,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只是记录黄帝的言行,并不能证明这些文书已用于对各部落的领导和管理,更无法证明这些文书将黄帝旨意传递到了各个部落,所以也只能起到“备忘”和“信守”的作用。再说,当时的书写手段是刻写,制作每个文件必须一片一片地去刻,很不方便,就算能做到,也如前所说,各部落的首领也未必能够认读。另外,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有关黄帝时期各部落也有类似于“史官”这样的人物,以及各部落用文书向黄帝请示报告的传说。由此可见,当

时的文书的功能只限于“记载”，并没有进入到传递阶段，也就是说，还没有使用文书，至少不主要使用文书对下级实施领导和管理。即使到了商代，文字已相当发达，据翦伯赞先生说，当时“甲骨文共有单字约在三千以上”。^⑬但从安阳出土的约十万片甲骨刻辞来看，基本上是卜辞，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王襄的《殷契征文》和《安阳发掘报告》都说明了这一点。由于远古时期，人们十分迷信，占卜也就成决策的手段，而表示占卜结果的卜辞自然也就是作为决策依据的文字形式，所以认为卜辞是公务文书不无道理。但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卜辞只是对商王决策动机和某种行为意图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没有反映商王对各诸侯的各种具体的指示和部署，也没有史料可以证明这些卜辞作为公文送达各个诸侯。因为从甲骨文出土的情况来看，这些甲骨文书大量集中在安阳——这个当年商代的都城，而各诸侯所在地却没有相应发现这类甲骨文书，如果公文已经下达，那么这些地方也理所当然地留有这样的公文。而且，也没有专家学者谈到过这些甲骨文书中有各诸侯上报的公文，这就说明当时还没有出现多少公文的往来，起码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形成完备的公文往来体系。

管理是以纵向为主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是管理系统的主要结构关系。一方面是上级对下级的命令和指挥，另一方面是下级对上级的执行和服从，于是在管理过程中，上下级之间必然会形成信息的对流，因为离开了信息，也就无法实施管理。既然，及至商代尚未形成完备的公文往来体系，那么领导的信息是怎么传递下去，而下级的信息又怎么传递上来的呢？很显然，当时还是主要靠人用口语来传递。有学者认为，

在黄帝之前,部落首领的旨意是由人通过口语来传达的,这种说法没错,然而,不仅仅是黄帝时期之前,包括黄帝和黄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信息仍主要由人通过口语来进行传达。时至今日,文书制作的技术和文书传递的手段可谓先进,但由人通过口语进行信息传递的这种方式依然存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信息传递都需要用文书形式。召开会议,包括电话会议、电视会议,无需下文,领导便直接将有关信息传递给了下级;而秘书人员通过电话或亲自到下级机关单位去一趟,传达领导的指示或了解有关情况,并向领导汇报,这也是常有的事情。我们总不能说,秘书起草文件、收发文件是秘书工作,而秘书用口头传达信息就不是秘书工作。翁世荣先生在《现代秘书学》中有这样一段话:“舜设立九官以治天下,其中有纳言一职,命一位叫龙的人担任。《尚书·尧典》记载:‘帝曰:龙!朕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就是说,纳言的职掌是不论白天晚上,随时宣布舜发布的指令,并忠实地汇报民情,不让说坏话、做坏事的人胡作非为、震惊百姓。可见,纳言是起上下沟通作用的人员,当是典型的秘书人员。”^⑭李欣先生在其《中国秘书发展史》中也完全赞同翁世荣先生的看法,也认为“龙”这个纳言“当是典型的秘书官职”,^⑮并且援引资料作佐证:“《史记·五帝本纪》孔安国注:‘纳言,喉舌之官也,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信也。’”^⑯其他的秘书学教材和专著,凡讲到中国秘书工作起源的,大多提到“龙”,而且也一致认为“龙”是那个时代的秘书人员。如按史料所说,“龙”显然不掌管文书工作,但翁、李两位先生又都认为“龙”是典型的秘书人员,这就同有了文字和文书才有秘书工作的说法不一致了。既然不涉及文书工作的

“龙”是典型的秘书人员,那么在黄帝之前,那些为部落首领传递信息,起上下沟通作用的人为什么就不是秘书人员,他们所做的工作为什么就不是秘书工作了呢?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说,秘书工作的产生源于为实施管理而传递信息的需要,文书工作的出现只是信息传递方式的一种进步,不能作为判断秘书工作是否产生的标准。因此,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当领导者为实施有效管理,需要有人协助他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时,秘书和秘书工作也就开始出现。

下面接着谈社会权力机构与秘书工作起源的关系。

既然,秘书工作的产生不以文字和文书的产生为条件,那么是不是一定要以李欣先生所说的“社会权力机构”或翁世荣先生所说的“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为前提呢?同样未必。

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个渐进的过程,当它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也就需要管理,否则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得以继续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或多或少地需要管理。”^⑦由此可见,管理的出现并不需要社会发展到很高的层次。黄帝时代乃是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不仅拥有一批史官,而且设有“六相”,分管各个方面的工作。这样的组织机构,这样的管理规模,在原始社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有秘书和秘书工作是不足为奇的。然而,人类社会不可能从原始群体直接跨入部落联盟,中间经过了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漫长阶段。吕振羽先生在《简明中国通史》中对氏族组织作这样叙述:“当时的社会,是具有相当发展状态的氏族制度的组织。由于氏族发展为胞族,胞族发展为部落,最后到传说的‘尧’‘舜’时代又形成为部落联合。据‘尧典’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在这一部落联合中,共包含九个部落

(九族),九个部落共包含一百个胞族(百姓),一百个胞族共包含若干氏族(万邦)。”^⑩就算保守一点,按每个氏族十个人计算,一个胞族就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人,而一个部落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人。由此可见,在部落联盟形成之前,部落已具有较大的规模,连胞族的规模也不小。很显然,在氏族时期,当管理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时候,只需首领一人,就能管理好整个氏族,但当氏族发展为胞族,乃至部落的时候,由于社会群体已达到较大的规模,这样胞族和部落的首领,仅靠他一人是难以应付的,就必须配备一个或几个助手来协助他工作,替他跑跑腿,为他传递信息和了解情况,以及帮助他处理一些氏族或部落的事务。这些工作就是原始的秘书工作,这些助手就是原始的秘书人员。从一般情况来看,总是先有助手,而后再有领导机构的。尽管时隔好几千年,但我们仍不妨借助当今社会的某些现象来分析这个问题。如一些规模很小的单位,单位领导往往只配备秘书,而不设副职,更不组建领导机构和设立领导部门;而有领导班子,却没有秘书的单位,恐怕很难找到。因为有领导机构,就有权力分掌的问题,只有管理的复杂性达到一定程度,即有些工作必须要有人分管,不设领导机构,就无法实施有效管理的时候,才会有领导机构的产生,这应该是一般的规律,反映的是一般的权力心理。总之,秘书和秘书工作的起源与社会权力有关,而与“社会权力机构”或“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可以这样推断,在出现“社会权力机构”或“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之前,在部落时期,甚至在胞族时期,秘书和秘书工作就已经产生。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可以认为,文字和文书以及社会权力机构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都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

要前提。只要社会管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领导者个人需要有助手协助他传递信息和处理事务,秘书和秘书工作也就产生了。其实,我们只要认真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既然黄帝时期已经拥有了苍颉、沮诵等一批专职的秘书人员,而且两者之间还要明确的分工,这显然不像是秘书工作的源头状态。

在秘书学研究初期,探寻秘书工作的起源,总是以斯大林有关阶级、文字、国家、文书的那段话为指导思想,由于中国国家后于文字产生,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把秘书工作的起源定在了夏、商、周这个历史年代。以后思想认识虽然有了发展,但仍然没有突破领导集团和文书工作这两个框架,由于黄帝时代有了领导机构,又有了文字、文书和从事文书工作的史官,于是就把秘书工作的起源定在了部落联盟昌盛时期的黄帝时代。之所以出现认识上这种偏差,关键在于没有十分准确地把握秘书工作辅助性的这一基本特征,并且把管理过程中的信息工作局限于文书这种形式。

二、秘书的涵义

有了秘书,自然应该有秘书的涵义,虽然中国有几千年的秘书工作史,但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对秘书和秘书工作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因此也就没有对秘书的涵义作出界定。我国对秘书学较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是从80年代开始的,与恢复对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同步进行。在研究过程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秘书定义的问题,80年代中期,秘书学界还专门对秘书的定义展开过大讨论,但观点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以至有的学者竟把这个问题放到了秘书学理论之“珠

峰”的地位。这个比喻并不夸张,的确反映了真实情况。为什么仅仅一个概念就这样难下定义,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尽管国外对秘书学早有研究,但由于国情的不同,我国的秘书工作和秘书制度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虽然可以有所借鉴,但却不能直接照搬,况且这些国家的说法也不尽相同。我们所要构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秘书学,因此,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秘书史,但当研究起步的时候,所面对的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开展研究工作至今才十几年,在探索的过程中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正常的,而且近年来观点也在逐步地接近。

其二,直到现在对“什么人属于秘书”还没有一个法定的权威性的确认,也没有一个公众一致的认识,这样必然会有一定的随意性。比如从事同样的工作,在这个单位称之为秘书,而在另一个单位却不叫秘书。一般来说,直接为领导个人服务的和起草文件的工作人员是被叫做秘书的,但在办公室里工作的许多人,包括直接承担文书工作的人,却大多数不称其为秘书。秘书的概念恐怕不应涵盖面这么小。

其三,秘书不是职称,不是职业,也不是职位,而是一种职务,这也是难以界定的一个原因。有学者建议,秘书应该成为一种职业,像教师、医生、律师、会计那样。也有学者建议,秘书应该有相应的职称,至少像英国那样分几个等级。这些建议当然很好,但在近期还不太可能实现。

其四,秘书部门是综合性的部门,与职能部门不同,它所承担的职责是多方面的,各个岗位工作的性质有所不同,有的差别还很大,如从事机要工作的和从事事务工作的,其工作性质和要求都大不相同,这也给界定带来了困难。

其五,自改革开放以来,秘书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而且这种发展变化仍在持续,要准确判断正在变动中的事物的性质和特点的确不容易。

正因为如此,所以至今也还没有一个被普遍认同的定义。

虽然是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观点,一类是现代的观点。传统的观点主要是以传统的秘书工作为依据,与一般流行的秘书起源认识相联系的。其最大的特点是把秘书工作同文书工作捆绑在一起,以文书工作作为界定的核心。如1978年版的《辞海》对“秘书”一词的解释是:“职务名称之一,是领导的助手。秘书工作是一项机要性工作,它的任务是收发文件,办理文书、档案和领导交办事宜。”这一注释明显地突出了文书工作,旁及到的也只是“领导交办事宜”。《辞海》的解释代表了80年代前的观点。1996年再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秘书”一词是这样解释的:“掌管文书并协助机关或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工作的人员。”这同《辞海》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把“领导交办事宜”换成“协助机关或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工作”。由于80年代前秘书学研究尚未兴起,因此《辞海》继续沿用传统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而《现代汉语词典》在修订时既没有注意秘书工作的现状,也没有注意吸收十多年来秘书学研究的新成果,而是固守传统的认识,一字不改地保留了1978年版的注释,这就显得十分守旧了。此外,也还有少数学者坚持传统的观点。现代的观点发端于80年代,当时论家蜂起,各抒己见,常崇宜、张清明、陈广胜等先生都曾撰文对各家的观点进行过分析和评论,翁世荣先生在其《现代秘书学》一书中也作了类似的评析。

各家观点虽有所不同,但取向一致。他们都关注新时期秘